

[旧版文章](#)[天人古今](#)

- [古今通论](#)
- [古代通论](#)
- [世界史论](#)
- [当代三农](#)
- [现实问题](#)
- [旁通类鉴](#)

[先秦史论](#)

- [先秦通论](#)
- [原始经济](#)
- [文明起源](#)
- [夏商西周](#)
- [春秋战国](#)

[汉唐史论](#)

- [汉唐通论](#)
- [战国秦汉](#)
- [秦国秦代](#)
- [西汉东汉](#)
- [魏晋南北朝](#)
- [隋唐五代](#)

[宋元史论](#)

- [宋元通论](#)
- [唐宋通论](#)
- [北宋南宋](#)
- [辽金西夏](#)
- [蒙元史论](#)

[明清史论](#)

- [明清通论](#)
- [明代通论](#)
- [明中后期](#)
- [清代通论](#)
- [清代前期](#)

[近代史论](#)

- [近代通论](#)
- [清代晚期](#)
- [民国通论](#)
- [民国初年](#)
- [国民政府](#)
- [红色区域](#)

[现代史论](#)

- [近世通论](#)
- [现代通论](#)
- [前十七年](#)
- [文革时期](#)
- [改革开放](#)

[学科春秋](#)

- [学科发展](#)
- [专题述评](#)
- [年度述评](#)
- [学人学术](#)
- [学者小档](#)

[理论方法](#)

- [史观史法](#)

[国学网](#)——[中国经济史论坛](#) / [理论方法](#) / [史观史法](#) / [《经济史：历史观与方法论》](#) / [社会学与历史学](#)

## 社会学与历史学

2007-02-06 吴承明 作者提供 点击: 1231

### 社会学与历史学

## 社会学与历史学

### 《经济史：历史观与方法论》第七章第一节

吴承明

作者提供

### 第七章 社会学理论与经济史的研究

#### 第一节 社会学与历史学

社会学与历史学关系密切。历史学原来就有社会史的内容。19世纪中叶，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，创造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，大大有益于历史尤其是经济史的研究。

中国传统的纪传体史学着重政治史和上层人物的活动，甚少社会内容。梁启超曾痛其弊曰“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”，并于《新史学》中倡议“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之例”<sup>(1)</sup>，这显然是受A. 孔德、H. 斯宾塞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影响。1903年严复首先将斯宾塞的《社会学研究》介绍到中国，译名《群学肄言》。留学英国归来的中国第一位社会学家陶孟和，于1926—1952年领导社会调查所、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、社会研究所（实为一个机构递嬗）凡27年。陶孟和十分重视社会经济问题，于1932年创刊《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》。陶希圣于1934年创刊的《食货》半月刊也是经济史与社会史并重的。两刊都聚集了大批专家，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。解放后，《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》停刊，而于1952年的教育改革中，取消大学的社会学课程，陶孟和领导的社会研究所也改为经济研究所，社会学成为学术禁区，史学界也不敢研究社会问题了。揆其故大约是，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，左倾思想正盛，倡以阶级斗争为纲；而西方的社会学大都是讲进化论的，主张社会和谐稳定，以利发展。当时占主流思想的结构功能学派，即认为社会各系统的功能都在于维护整体的均衡，而社会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促进社会的稳定。这样，社会学在中国沉寂了27年，直到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政策，才翻然改观。国内也讲安定团结了，后来甚至提出构建和谐社会。大学恢复社会学课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再建社会学研究所，各种社会福利和调查研究机构林立。史学界也重新与社会研究结合，著述琳琅满目，并出现以傅衣凌为首的社会经济史学派。

这是说中国。其实在西方，社会学也不是与历史学亲密无间的。孔德是在法国大革命后王朝复辟的动荡时代，在《有关重组社会计划》

（1822）中首次提出“社会学”，目的在重建自由的社会，受到进步人士的热烈拥护。但他的社会学理论是在他的《实证哲学教程》第四卷（1838）中，作为研究社会、经济、历史的一门学科提出的。此论发表不久，就受到历史哲学家的批判，从德国的狄尔泰、文德尔班、李凯尔特到意大利的克罗齐，到英国的克林伍德达到高峰。这在本书第五章第三节已作了介绍。另外，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治学的风格迥异，也招致隔阂。历史学家讲究史实根据，考证入微。而当时孔德、斯宾塞的社会

历史理论  
领域视野  
方法手段  
规范学风

## 史料索引

古今文献  
考古文物  
简帛文书  
回忆追述  
社会调查  
论著索引

## 论著评介

通论文集  
古代史著  
明清史著  
近代史著  
现代史著

## 动态信息

期刊集刊  
网站网刊  
团体机构  
学术会议  
研究动向

## 他山之石

世坛综考  
美国史坛  
西欧史坛  
东亚史坛  
其他地区

## 池月山云

文史随笔  
知识小品  
诗词诗话  
文艺点评  
小说演义  
史眼世心

学还主要是用概念、范畴构建理论，对于家庭、族群、社区等具体活动尚少调查材料，历史学家讥为空谈。占主流地位的兰克史学原主攻政治史、军事史，这时正由编年史进入国家档案的研究，特重外交。他们认为军国大事和外交策略才是历史的严肃内容，而那些社会现象只是琐闻杂记，无足轻重，对于那种“没有人名的历史”（指社会史），不足一顾。而社会学家注意基层组织和群体意识形态，往往不屑于谈政治，更蔑视英雄伟人。斯宾塞说，那些君主的传记对于社会研究没有任何启示。

19世纪末，20世纪初，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历史学与社会学密切合作了。这首先是出现了两位学誉并隆的社会学大师，即法国的D. E. 涂尔干（或译杜尔凯姆，1858-1917）和德国的M. 韦伯（1864-1920），而他们都是历史学家。

涂尔干著《社会分工论》（1893），认为“集体生活并非产生于个人生活，相反，个人生活是从集体生活产生出来的。”(2)由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，人类社会由古代同质的（同一劳动）、由集体意识结合起来的乡村组织，演变为异质的（各有专业和图谋）、由国家 and 法律强制性结合起来的近代社会。这种演变是社会的进步，但也带来“失范”：集体意志消失，道德衰退，工商业危机，劳资冲突，学术界彼此不信任等。社会学研究，就在于稳定社会群体，尤其是职业群体，“使这些群体更加牢靠地留住个人，个人更加依恋群体。”(3)在方法论上，涂尔干也是实证主义者，他不像孔德、斯宾塞那样从概念上研究社会，而是主张把社会现象当作客观事物（choses），一件件去探讨它们。这就进入历史学了。在他的名著《社会学研究方法》（1895）中，把社会现象定义为“独立于个人”而“由外界强制力作用于个人而使人感受的”现象。(4)对于这种社会现象，要分析它的“功能”，更要考察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，即因果分析。涂尔干本人就研究过自杀、宗教、教育等社会现象，并用统计方法分析自杀的原因，得出自杀是源于社会因素，而非个人心理失衡的结论。他说“社会现象的原因必须从社会环境中去寻找”，因果分析必须“从社会内部去进行”，那种把原因归之于个人的学说（按指心理学派、功利学派社会学）的错误在于：“用社会的部分去解释与这些部分性质不同的社会整体。”(5)这就是整体论方法。

韦伯是历史学家、经济学家、政治活动家，40岁以后研究社会学，成为独树一帜的社会学家。孔德、斯宾塞认为，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，社会关系是客观存在，因而要用研究自然的科学方法即实证主义的方法去研究社会。韦伯不同，他认为社会是个体即人有意识的行动（或行为，action, agent）建构出来的，被称为建构主义（constructionism）的社会学。社会学的任务即在于诠释（理解）主体人的行动怎样建构这个社会，故其社会学又被称为诠释的社会学。诠释要理解主体和主体间的意向即动机，又要理解他们行动的成果即客体，而重点是探讨其因果关系。这样，韦伯的社会学，在方法论上几乎与历史学、尤其是狄尔泰的诠释学完全一致，他也和狄尔泰一样，认为理解社会不能用从外部分析的实证主义方法，只能用“移情”的方法从内部来诠释。不过狄尔泰的诠释学是诠释历史文本，社会学没有什么文本，而是诠释人们的行动。

韦伯是个理性主义者。他的名著《经济与社会》(6)就在于解释家庭、村社、田庄和军事政治群体怎样通过理性化过程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。韦伯首次提出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。他对目的理性的定义晦涩难懂，我在第三章第二节作了解释。他对价值理性的定义比较明白，意在说伦理道德行为应该是不计后果的，例如为获得好名声或善报而行善，就不是理性行为了。(7)韦伯的社会学实际是研究目的理性行动的，而那些传统式（习俗）行动、感情式行动以至价值理性行动，乃是对目的理性的偏离。在社会的进步中，最重要的理性活动是货币和市场的出现，因为它们使任何人可以计算功效。中国人最熟悉的是韦伯的《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》（1905）和《儒教与道教》（1915）。前书以加尔文新教要求教徒勤劳、节俭、拼命赚钱以完成上帝给予的天职，是建构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精神。后文则认为中国儒生不敬上帝、不做礼拜、仅孝父母和稻粱谋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。话有点荒唐，而其实际意思是，中国文化，迄1915年，背离了目的理性。

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西方历史学界也发生了变化，他们不满于单纯的政治、军事、外交史，而转注意于社会、经济、劳动和文化。最早是德国的K. 兰普雷希特，他反对正统史学之专注意“政治和伟人”，要求写包括社会心理的“群体历史”。他的《德国史》（1891-1909）曾引起一场争论。美国的F. J. 特纳提出历史要“全方位考虑人的活动”，并把区域史和地理环境引入他的历史著作。美国的J. H. 鲁滨逊



著《新史学》(1912),说“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作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,都应该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。大到可以描写各民族的兴亡,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。”他主张用综合方法解释历史,把经济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、心理学的观点都吸收进来。经济学家、社会学家、人类学家的思想,“无疑地跑得太快,失去分寸”,但历史学家不能抱残守缺,“心安理得地什么也不去想了”。(8)

经济史学这时已经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,进入20世纪,日益注意社会研究,出现社会经济史的大师。德国的W.桑巴特以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著名,而晚年更著《国民经济与社会学》(1930)、《社会学》(1936)。英国的R.H.托尼是人口与土地问题专家,但其《贪得无厌的社会》(1920)、《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》

(1926)则进入社会史。美国的J.W.汤普逊受鲁滨逊的影响,著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》(1928),寓论于史,经济与社会统一。W.C.米切尔是货币史专家,但也用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研究经济制度,创建并主持社会研究所。比利时的H.皮朗以《比利时史》著名,然亦著《中世纪的城市》(1925)属社会经济史。当然,最为著称的是法国1929年创刊的《经济社会史年鉴》和随之形成的法国年鉴学派,成为经济史与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中心,名家辈出,享誉世界,这将于下节专述。

涂尔干于1917年、韦伯于1920年去世,社会学研究中心由欧洲移到美国。美国人是实用主义者,重现实而轻历史。一次世界大战后,美国社会学家主要研究人口问题、劳工问题、社会福利问题,妇女儿童问题,这些研究也涉及历史,但属专业史。加以社会人类学自B.M.马林诺夫斯基倡行田野工作以来,社会学家也日益重视社会调查,并创立了一套科学的调查方法,成为社会学的一个专业(其实这对历史学是非常有益的,特别是多次横断面追踪调查法)。理论方面,韦伯的后继者分化为不同学派,但除德国人A.舒茨外大都不重视历史,社会学与历史学再次隔阂。舒茨著《社会世界的现象学》(1932),显系受E.胡塞尔影响。涂尔干、韦伯以后,西方社会学中最突出的人物当属美国的T.帕森斯(1902-1979),他的社会学理论被称为“结构功能主义”,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,有称霸学坛之势。

功能主义是社会学的传统,始于斯宾塞。如前所说,斯宾塞认为社会每个组成部分的功能(职能、作用)都在于维护整体的生存和发展,最好是像生物有机体那样,四肢的动作都服从头脑,没有矛盾。但社会的各组成部分总是有矛盾的,意大利的V.帕累托看到这点,提出动态均衡理论说,各部门的功能一旦失衡,就会有一种力量使它恢复均衡。英国人类学家B.M.马林诺夫斯基研究民族文化各要素的活动,它们相互作用有效地构成文化整体,被称为人类学功能主义的创始人。帕森斯重视文化功能,并采取均衡说。而历史学家则一贯不喜欢功能主义,因为历史上社会平稳的日子没什么可说,他们更重视动乱与战争。

结构主义始于马克思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,并因此导出历史上相继出现的各种社会形态。社会学家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经济决定论,有违以人为主体的建构主义,故少采用。其实马克思早已指出人因受物质条件物化或异化,才服从于现行不合理的社会结构,而终究是要推翻它,因而是一种批判的结构主义。历史学方面,法国的年鉴学派和后来的M.福柯的结构主义都是由批判的结构主义发展而来。到20世纪四、五十年代,又兴起经济学和文化学的结构主义。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是把经济部门结构的优化(反映资源配置的合理化)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标志,代替了生产力的线性增长,而把经济增长的失败归之于结构危机。文化方面,则有法国人类学家C.列维-斯特劳斯创结构分析法,将文化现象分解为若干基本要素,考察其相互转变的过程,以及转变中的中介状态。帕森斯大约也吸取了马克思和列维-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,用于功能学说,创建了一套独特的社会功能的结构模型。

帕森斯的模型是把社会行动分为A. G. I. L四个功能系统: A是适应(Adaptation)系统,其功能在于从外界获取资源并加改造以适应人类生存,实即经济系统。G是达成目标(Goal attainment)系统,即决策和实现目标的政治系统。I是整合(Integration)系统,其功能在于保持社会团结一致,如法律、宗教、社团等均属之。L是潜在因素(Latency),即维护正常状态(pattern maintenance)的系统,亦即家庭、教育、传播思想的文化系统。这种功能结构能维护整个社会行动的均衡,并能适应社会变迁或冲突而恢复均衡。帕森斯的这种模型是建立在逻辑实证主义之上的,而非以经验实证为据,因而是脱离历史的。在他的模型中,行动者或者主体不是具体的人,而是观念的角色,乃至讲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时,他也是用“扩散性角色”“专一性角色”等术语(9),而避免用历史的

语言。在帕森斯和哈佛社会关系学院（帕氏任院长）诸公的著作中，都很少讲历史，不用历史实证主义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西方社会学也和经济学、历史学一样，发生很大的动荡和反思。有人强调社会上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，提出“符号互动主义”、“日常生活方法论”等主观社会学。有人继承帕累托传统，倡行“社会交换理论”，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计算利益得失的交换行为。而最大的思潮是“社会冲突理论”和“社会批判论”的兴起，两者多少都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。原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学原理，再如结构主义、社会交往理论、异化论等也都是马克思首倡的。但在19世纪，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受到建构主义、功能主义和帕累托功利主义的抵制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受到重视，二次大战后广为流行起来。二战后的社会冲突论是针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过于强调均衡、稳定而发起的，先后有美国的W. 米尔斯，德国的R. 达伦多夫、美国的L. 科塞等多家。他们强调社会结构的强制性，社会冲突的普遍性，以至认为冲突是社会进化的动力。社会批判论也有多家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M. 霍克海默和T. 阿多尔诺，以及H. 马尔库塞，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。他们继承马克思的批判社会学，当然又都有自己的见解，而不是“原教旨主义”的马克思主义了。

二战后西方社会学众说纷纭，到80年代，逐渐集中为三大理论，成鼎足之势。这就是：以美国J. C. 亚历山大为首的“新功能主义”，英国A. 吉登斯的“结构化理论”，德国J. 哈贝马斯的“交往行动理论”。哈贝马斯的交往（沟通）行动理论，自称是“重建历史唯物主义”，已于第四章第二节详为介绍，这里从略。所谓“新功能主义”是坚持功能主义分析模式的一个力图综合各家学说的松散学派，以美国学者为主，也有德国、英国学者。亚历山大本人是继承帕森斯传统，而对帕森斯之反经验主义、反社会变迁（即反历史）、反个人主义（即反主观社会学）有所修正。他容纳了对立派思想，甚至冲突论、批判论。他在分析每个主题时（他以行动、秩序和怎样由个人到社会为主题），往往首列马克思的观点，再列各家观点，取长补短，足见马克思思想在二战后的重要地位。而另一位新功能主义者德国的N. 卢曼，也是从个人互动怎样到社会组织为主题综合各家的理论，但提出他自己的《社会分化》（1982）理论，其精彩之处几乎与哈贝马斯的交往（沟通）理论一致。卢曼与哈贝马斯的书同时出版，难说谁影响谁，其实，他们的交往理论都源于马克思。

吉登斯的“结构化理论”也是调和各派思想的，但亦可称独树一帜。原来，古典社会学家都坚持部分属于整体、社会优先于个人，因而社会结构对个人行动有约束力。功能主义者认为社会结构是由社会各系统的功能形成的，对个人说是客观存在，研究它约束个人行动，也就是用宏观社会现象来解释微观行动。二次大战后，美国兴起主观社会学，认为社会结构、社会制度是由行动者个人有意识地建构的，如交换理论、符号互动主义、日常生活方法论等社会学派均属之。这种研究是用微观行动来解释社会宏观现象。主观与客观、微观与宏观的对立成为二战后社会学界争论的焦点。

吉登斯认为，社会的宏观现象（社会结构、社会制度）与微观现象（个人行动、有意识地建构）二者并不是互相独立存在，它们具有二重性，是互相包容、互相促进的。行动者建构社会，即行动“结构化”；社会结构提供行动者以选择（即所谓约束），于是行动再建构社会，即行动再结构化。这就消解了宏观与微观，主观与客观、行动与结构的对立。然而，吉登斯的独树一帜不在于消解这些对立，而在于他对“结构化”的定义和理解。他认为，人类是在获取和利用物质资源的过程中建构社会，使行动结构化的。也就是说，结构=资源+规则。这显然是受马克思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的影响，不过在社会的再生产中，他更注意结构（上层建筑）的作用。吉登斯还认为，行动的结构化总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进行的，行动的模式本质上是历史的。它批判某些社会学家（实指逻辑实证主义者）要求建立“非历史的”（ahistorical）社会定律是荒谬的。

1990年吉登斯出版《现代性的后果》。他不满意于后现代主义者之否定现代性，而提出了一个应付现代化危机的“乌托邦现实主义”的方案。它实际是，号召个人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（劳工运动、言论自由和民主运动、和平运动、生态运动），造成“解放的政治”和“生活的政治”，重建平等自由的社会。他说：“社会运动为我们显露了可能的未来的曙光，而且在某些方面它们成了通向未来的车轮。”（10）这也就是个人行动再生产的结构化，微观行动再生产宏观社会。吉登



斯的这个方案是很低调的，被讥为“中间路线”。我也认为他这个改造社会的方案无足取，但他在论述现代化危机中的历史观却很有意义，特为介绍如下。

吉登斯说，当前全球化的现代化危机表明人类历史的一次“断裂”。人类历史经历过多次断裂，马克思的几种社会形态论就是断裂。他认为，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种种理论并不能“超越”历史，只表示启蒙运动以来进化论历史观的终结。吉登斯认为，历史是多元的，没有固定的形式，历史发展没有目的性，没有一个总的发展方向，也没有一个普遍性的发展动力。“历史并不具有由进化论概念所创造的总体性形式”，也不具有“进化论的方向”。(11)今天人们对现代性的研究是一种对历史的“反思”。历史需要反思，特别在断裂的时候。“从根本的意义上说，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”，而社会学则是“用最普遍化的方式反思现代社会生活”。(12)在这种反思中，“再没有什么知识仍是‘原来’意义上的知识了，在原来的意义上，‘知道’就是能确定”，而今天变成了不确定，变成“与认识论中的原教旨主义决裂”，(13)与神意论的历史观决裂，与进化论的历史观决裂。而这就是历史性，历史的本性。“历史性意味着，运用过去的知识，作为与过去决裂的手段，或者，仅仅保留那些在原则上被证明是合理的东西。历史性实际上主要是要引导我们走向未来。未来被看成在本质上是开放的”。(14)反思、与过去决裂、发展未来，也就是以史为鉴。吉登斯在政治上是折衷主义，在历史观上则颇为可取。

#### 第七章注释:

(1) 梁启超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。

(2) 杜尔凯姆《社会分工论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36页。本书原名“社会劳动分工：超社会组织的研究”，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: Etude sur l'organisation des sociétés superieures.

(3) 《社会分工论》，同注(2)，第356页。

(4) 杜尔凯姆《社会学研究方法》，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。

(5) 《社会学研究方法》，同注(4)，第96页。

(6) 《经济与社会》是M.韦伯未完成的著作，由他的夫人和追随者编辑，首次发表于1920-1921年，后有多种版本，内容各异。中文有林荣远译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；李强译（改名《经济·社会领域及权力》）三联书店1998年版；以及周武彪的提要版，载《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》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。

(7) 韦伯关于目的理性的定义见本书第三章注(82)。他关于价值理性(Wertrationalität, value-rationality)的定义是：“价值合乎理性的，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——伦理的、美学的、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——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纯粹信仰，不管是否取得成就。”《经济与社会》上卷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页。

(8) J. H. 鲁滨逊《新史学》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、70页。

(9) T. 帕森斯《经济与社会》，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4、35页。

(10) 安东尼·吉登斯《现代性的后果》，（南京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-142页。

(11) 《现代性的后果》，同注(10)，第5、44页。

(12) 《现代性的后果》，同注(10)，第32、36页。

(13) 《现代性的后果》，同注(10)，第35、42页。

(14) 《现代性的后果》，同注(10)，第44-45页。

责任编辑: echo

[发表评论](#)

[查看评论](#)

[加入收藏](#)

[Email给朋友](#)

[打印本文](#)

平均得分 0, 共 0 人评分

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, 请先[登陆](#), 如果你仍未注册, 请点击[注册链接](#)注册成为本站会员.

1 2 3 4 5 6 7 8 9 10